

往事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游川游

|| 游川游 || 十一月廿五日

通过透露某种信息进行挑拨，让“小团体编者的话：曹天予先生的回忆文章《不应被遗忘的历史》，大量引用了前几年母校——北京大学退还的当年他被打成“反革命学生”的“罪行档案”。其中包括他被隔离整肃期间的交待材料，以及往来书信、日记、笔记、文稿等等。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似乎回到了那个严酷的年代，看到一伙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因共同的压抑和苦闷走到一起。他们试图以贫乏的文化资源，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寻找人生的意义。他们的思考方向不尽一致，但都反对极权主义，都追求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等人类普世的价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结局是悲惨的。其中大部分人遭受牢狱之灾，郭世英最后死得不明不白，留下了一段悬案。曹天予当年的文字对我们认识那段历史和专制极权的本质，无疑有着特殊的价值。

四十多年前，那伙年轻人之间的自由交往足以令人称羨，具备了诸多美好的因素：青春、才识、友谊、爱情、读书、探索、追求……本该留下终生的友谊和美好的怀念，却种下了疑忌和怨恨的种子。其实，在这个国度里，类似的故事反复搬演，郭世英、曹天予及“X 小组”事件不过是其中一例。在正常的条件下，年轻人在交往之中即使有冲突和矛盾，也不过导致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或者顶多是分道扬镳。但在郭、曹及“X 小组”的事例中，每个人都被逼至要进行无奈选择的地步：要么屈服忏悔、坦白交代，要么毁灭，甚至屈服忏悔也不能免于毁灭。

极端的权力一向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激起人们的希望、恐惧、仇恨，让人们互相猜忌，互相戒备，互相叛卖，而最有效的一招是通过透露某种信息进行挑拨，让“小团体”自己去玩寻找“害群之马”这一

现实生活简直不可忍受，一方面，谎言和的还有什么？朱学勤写过一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以纪念那些夭折了的思想。透过曹天予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思想的来源：黑格尔、青年马克思、卢卡奇、罗素、实证主义、异化、人道主义；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陶里亚蒂和多列士……只是在近二十年后，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思想界才重新接续这些失落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算是上个世纪后期以来思想解放的先驱。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又是五七年右派言论的继承者，是那些反叛声音的余绪。

那一时代，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庐山会议……真相被一点一点地披露出来，历史以延迟的方式在这些年轻的头脑中激起强烈的反响。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消息：党内“改革派”在推进“非斯大林化”，总有一天会有变化……总体而言，他们的预言是正确的，但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手无寸铁的预言家最终失败。对年轻的心灵和头脑而言，封闭而压抑的现实生活简直不可忍受：一方面，谎言和虚伪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僵硬乏味的意识形态容不下哪怕稍微丰富一点的思想感情。形势并没有像他们估计的那样好转，反而急转直下，越来越糟。这是一次精神突围的尝试，其最鲁莽的行为是出“X 杂志”，最绝望的表现是“偷越国境”（这次行动完全没有悬念，还没开始就夭折了）。

四十多年过去，他们的思考被前尘覆盖；他们的预言有的已被历史证实，有的仍有待证实，这些都自不待言。在思想“体制化”和利益化的今天，他们勇敢的探索和求真的精神、他们非功利的精神追求仍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令人不解的是，郭、曹及“X 小组”事件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当年那些激进青年的灾祸特别是郭世英之死的根源，在今天已经不言自明了。然而，那个寻找“害群之马”——告密者的游戏仍然在继续，它出现在各类小报的报端。不过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严肃性，已经变得使人“喜闻乐见”。“反革命小集团”案件变成“寻找告密者”的游戏，最后沦为媒体竞相炒作的卖点，正好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注意力又一次被转移，最初的反叛和沉重的命运被解构为大众娱乐的要素。在一片关于琐碎细节的争吵中，我们又窥见当年那位“青年导师”的身影，他的观点并无改变，还是那样“正确”，让我们不禁产生了怀疑：这世道究竟变了多少？

因版面有限，我们对原文进行了删节；又因作者在外，所以只好草草写，其而引江，请担原

按语：曹天予先生的回忆《不应被遗忘的历史》。引用了前几年他的母校北京大学的游戏的结果是打击他们的尊严和道德感，毒化同伴之间的气氛，并以此转移对专制权力的抵制。郭、曹及“X 小组”的年轻人显然不谙生存策略，结局是“人仰马翻”，家破人亡。

极权制度鼓吹绝对斗争，扭曲了人性，毒化了社会气氛，破坏了人伦和道德的基础，在人与人之间，在朋友、恋人和亲人之间，散播怀疑、不和与仇恨的种子；存善心、讲真话都成了罪恶的渊藪；在严酷的“道德主义”的表层下，正常的社会行为规范——道德全面瓦解。在高层，经过残酷的权力斗争之后爬上高位的人，大多是几起几落、伤痕累累，心理与道德残缺不全；在下层，人们互相防备、互相监视、互相揭发，狂热和冷酷交织，“与人斗其乐无穷”，“整人”和“被整”成了家常便饭……所以，“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什么突发事件，而是这一局面合乎逻辑的结果。

揭露、批判和否定文化专制的本质，是建立社会道德的先决条件，若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所谓“以德治国”、“以德育人”不过是鼓励虚伪罢了。人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比如那些贪官，在被戳穿之前都高谈“廉政”，在被戳穿之后都声言“辜负了党教育多年”。

穿之前，不是都高谈“廉政”，在被戳穿之后都声言“辜负了党教育多年”等等

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加以渲染，回思其又重小组反叛。1967年初，中

对于曹天予的种种点名和不点名的指责，诸如“利用-出卖朋友”、“热衷于攀附名流”……已流传有年。我始终未置一词。因为没有时间和兴趣。感谢周国平先生“自传”，逼迫我翻检尘封多年的档案。

所谓“档案”，是指1964年北大“反动学生曹天予”专案材料。几经周折，它们终于在1985年秋被退还。

这总计百余万字材料中，写于1964年8月的一份“交待”，内容比较集中。这是政治高压下的“低头认罪”，强权威逼下的“彻底坦白”。对周书所涉若干故事，诸如郭世英、曹天予在1962年9月至1964年2月间的关系；曹给郭沫若两次写信；曹在X小组案发中的作用；郭曹1963年5月18日后两次见面情况，亦有明白翔实的记录。

现依原文，将这份“交代”摘录如下（引自档案中其它材料以为补充说明者，皆置方括号[]中

[1962年]9月10号，看到郭世英，立刻判断，这是个自命不凡的人。我当时蔑视他。

又过了二天，我只当不知他是郭老的儿子，骂开了：昨天有一足球队员来找郭老的儿子。

这种权贵出身[身]的，总会有人上门奉[逢]迎。他脸红了[1962年招生政策改变，我得以考上北大。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我因此收到了很多来信。到北大后，趾高气扬，看不起人。——04。]

我越是不理他，他越是想找我聊。到九月下旬，一次下午上课，我拿出自己的“黑格尔美学初探”在改。他借去翻翻，下课时说他带回去仔细看。十月初，两人关系亲近起来。

62年11月7日，郭约我散步。我先骂系里教条主义、无知，他对我骂起他母亲，又引申到整个高级干部，骂他们等升级、养尊处优。我听了表示不可思议，但内心却对形势的估计更进了一步：认为

9日晚，与郭一起去张家。谈了哲学，争论世界可知性问题。

11月14日，郭：你应该争取留学深造。我苦笑道：那不可能。他：为什么？我：我父亲是反革命。我为何五九年考不上大学，难道你真的相信报上说的是我成绩不好？郭愤慨之情溢然而露[我父亲是在中药铺里抓药的店员，仅因与店内支书为小事争执，1953年以历史问题（加入过国民党时期的工会）定罪，管制一年。他不服，给宋庆龄（他曾听说宋主持过“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写信上诉，竟以历史加现行反革命罪于1954年被判处徒刑。1960年，病饿交加，在远离家人的农场里孤零零地死

1967年1月初（我记不得具体时间，是我被囚禁后中央专案组的人告诉我的），我第一次去红卫

件给我看（我对郭一直说，苏联情况到底是否是修，想研究一下），是苏共中央反斯大林的文件。……又骂他家里母亲教条极了，令人压抑死了。我则要他理解作母[亲]的好心，原谅她的啰嗦。

62年11月23日晚八点多，郭告诉我，他一个朋友[孙经武——04]从军队里出来了。接着就告诉我他[指郭]以前送人越境叛国，孙经武为此进军队改造。[又说]现在把傻子当作理想来提倡，简直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我笑笑：人道主义要把人培养成聪慧的智者。这是要他“认清”我的马列主义与党的不一样。

郭又告诉我：孙在学校公开宣扬三和，反对全民皆兵。第二天他问我，愿不愿与那个孙经武见面。11月25日，下午一时许，我上郭家。我与他[们]大谈人道主义，骂现实的学术空气为教条，后来谈中苏分歧。郭赞成赫[鲁晓夫]的三和。孙张也是。

12月初，我上郭家几次。谈西方哲学、看画、骂过党虚无主义，并直接骂过党支书不懂艺术、教条而虚无。

那时我就想把郭与方[小早]拉在一起。我对郭称赞方聪明之类，想使郭对方感兴趣。对方称赞郭有义气，以前送人出去（即叛国）、为人真挚、有情意。使方很崇拜郭。

到十二月十四日[晚上]，郭来找我。说父母与他谈起（北大汇报的）他的交友情况，不让他与我来往。郭哭了，问我怎么办。我说，这都怪我，我原该知道身份，不与你来往的。他：他妈的，我还算人吗，连交个朋友都不允许了。我：我今后也不可能有什么出路。再读书也无聊，我退学回家吧。咱们俩好了一场，也算了吧。他：不行。你要回家就完了。既然学校容不得我们在一起，我退学。我退了，还有办法。咱们仍然能来往。我还是不愿意。到了[半夜]二、三点钟，他提起让我给他父亲写信，以挽回一下，说：要是我父亲赏识你，那就行了。我一听，心动了。

[64年8月6日交代：“62年12月14日夜郭告诉我父母不让来往，使我对学校、对档案制度痛恨极了。我给郭沫若写信时是满腔愤恨，挑剔、挖苦、嘲笑、谩骂，应有尽有，越写越不讲理。这信根本不是求赏识的，以至郭世英问我：你目的何在？他原希望我能使他父亲赏识，但没有一个求赏识的人像我那样写信。”]

63年1月10日左右，他父亲来信（给他的），其中劝我相信组织，不要猜疑，还要我们把字写清楚些等等……

[63年]1月16日上午，郭送我回家。我回家后，二十多天通了四封信。我写信说要回校念书了（怕反修）。他表示同意[说]他暑假来看我。

2月中旬，我急忙回来，因为我怕郭一下子爆发，被组织知道。2月17日上午，郭来车站接我，告诉我几件事：1、一月下旬，他父亲与翦谈起我的信，并给翦看。问翦感想。翦反问。郭答：有些像我们年轻时。翦问郭世英：他什么出身。世答：他父亲有问题。翦：可惜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套不行了。2、说他想搞一个X小组。我吓一跳。他告诉我先有张、孙，也把我算在内。性质是搞无政府主义（不过他讲的并不是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内部组织方面不立负责人之类）。名字叫X小组，表示对未知世界的不断探索。

我听他讲完后，就说了：（1）何必搞名称？（2）不该谈创作与政治。只谈学术。一谈艺术，与政治就容易沾边，危险。（3）出刊物太危险。尤其不能印。又说：这种事本身是很令人向往的。但太危险。我：别搞这种组织行不行？郭：不，我想搞。生活太苦闷了。我：你实在要搞也可以。但是，不谈政治，不搞文艺，只搞学术，别印东西。他：你写学术也行。张他们要搞文艺。不过我可以说服一下试试。我：我写不写还是以后再说吧。他：怎么，你不干？我们都等你回来2月20日成立，出第一刊物呢！我当时表示犹豫，说，先看看他们写的东西再说。

2月18日中午，郭与张来找我，要我表态。张尤其凶，一定要我参加写文章。我要先看看他们写的东西。张反对：你想写评论，定调子，那不行。大家平等，各人写自己的。我：不愿让看算了。我写不写还需斟酌。

郭问起我，方小早如何？我一口否定了。等张走后，郭：干脆你出来领头干。我拒绝了。

2月19日中午，张郭又来催了。我还是犹豫不定，说这事太危险。我：你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呢？郭：活跃思想、丰富生活。我：那自然可以。但何必搞这个？张：我还要扩大社会影响。我：那马上把你抓进去。张：抓进去也不怕，只要能发生影响就行。我：我马上去报告组织，免得你真去干。张：那你也跑不了。你的话，我都在日记上留着呢！出了事，就咬定你是主使者。你父亲与你的野花会帮你忙的[父亲事已如前述。“野花”指1957年上中学时我筹办的一个学生刊物，为此被公安局拘讯一天，后遭全校批判——04]。张使用威胁手段使我很火：我不干就不干……郭劝架。我愤愤地走了。

晚上我告诉方[小早]X小组事。我：这种事是很吸引人，但太危险了。可不参加郭又要伤心，对不起朋友。你说怎么办？方：这事很麻烦。他要让我参加，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你不能干。他们有后台。出了事没问题。你可不行，家里又不好。提起家里的事，是我下不了参加决心的很重要原因。方：何况，陈老师[党支部、班主任——04]嫉妒你，他吃政治饭的，不懂学术。你有才能，弄点成绩来堵堵他的嘴。别跟他们[指X小组成员——04]混在一起。

20日中午，郭来找我。我把决定告诉他。他很失望。但想了一会，说你不参加也好，可以分散精力，集中精力搞学术。我也很矛盾。既想叫你参加，又怕让你参加，免得以后拖累了你。我：我还是想搞学术，不想干别的。又劝他别搞。郭：生活太苦闷，你就让我干一个时期再说。到下午一点多，郭要去张家开成立会，让我去与他们说一声。

开“成立会”轮流表态。（共五人：孙、张、郭、叶、我）我表示我不参加。张火了：不参加你来干什么？我：那我走。张：你走也不行，你是幕后军师。我：那我先去交代（当时弄僵了）。我后来又说：我只希望你们出了事别连累我，我不会检举。张也表示这可以，说：把你牵出来，我们也没好处。事实上订了攻守同盟。那晚，我又几次要郭放弃。郭不听。

21日中午，郭与方来看我，我说，我想给总理打个报告，请他允许我出国看看。他们笑我做梦。

（2月18日在蔚秀园西，我曾谈起快反修了，我回学校很危险。张：那你为何又来了？郭：是来看我的。郭当时十分感激）。

张说要到钢院去，把窃来的总理在军队会议上的报告（未发表）内容漏给我们：主要是要抓阶级斗争、抓政治工作、禁止外国书籍电影入口、抓民兵训练等等。郭听后很敌视：但愿老天爷帮忙，别再来三年灾害。我笑了：问题不在老天爷，我对前途是乐观的。张恨恨地说：有什么可乐观的？我：这样干，矛盾会更尖锐化，也就更接近解决了……教条主义者不接受教训，到头来，矛盾紧张，中央会有人出来解决。（暗指亲苏派得势）。陈毅不就是想解决这一类矛盾，做过试探吗？张：你说的有道理。但恐怕你等不到了。我：那又有何妨，只要社会向前进了就行了。这是我向他们发出过的最露骨的变天幻想。我幻想这将会使社会上抗议阶级斗争不人道的呼声上涨。

2月底，“评多烈士”出来了，3月初，“再论陶里亚蒂”出来了。反修形势明朗，我恐慌了。我写二信给郭，说我们两人分歧太大，他受资产阶级影响太深等等。要他晚上早回校，别出事。

3月11日上午，郭问：你真想出国吗？我：当然，但这事太虚幻。他谈起自己想自杀，能自杀而不死，进医院休养几年。我说我也想回家休息一段。最近深入反修，我可能挨斗。

当时郭说他有枪。我说，你打我一下，可以打右胸，我就可以休学了。

[64年10月交代材料：“3月中旬，我与方逃课。陆平也知道了，打电话要追查。方说要到处流浪去。我说，咱们一起去。4月4日，在作走的准备时，又放心不下郭，写信给郭沫若，让他预防郭世英出事。”]

4月4日给郭沫若写了一信。说要找他谈几件事。当时企图是：（1）把郭世英的事全盘告诉他父；（2）表明自己一贯想拉他摆脱张影响、让他搞马

列主义。（3）家里应设法让他离开张。

不想郭与于看了后交给了郭世英（这是我后来先从张母亲那儿，后又从于立群那儿听来的），他一看对我就冷淡了起来。

4月19日中午，郭告诉我，他给我写了好多信，都撕了。我要他乐观些。

4月21日、4月22日，我见郭与张一直在一起。我怀疑他们已经干了什么事，于4月23日把郭的书籍和信全还给郭，以示绝交。郭的脸色白了。那以后，郭成天不在校。

5月6日上午见郭，他一付醉鬼样。我心疼又急，立即打电话给于立群（工作人员接），让接郭回去。

第二天组织要找我谈。我赶紧打电话找郭商量对策。郭不在家。我上张家一找，遇见了。我一看郭完全被张控制住了。刚出张家遇周国平。[64年8月交代材料：“他（周）告我他们想走，他急死了，怕郭出事。我没想到事态已如此严重。极其紧张。”]一商量，上郭家去找于立群。我提出：不要动郭世英；把事情悄悄解决。她要我不要顾及友情、应检举郭。我说，要再争取郭，让他有可能主动。于答应我再去找一次郭。关于最后一条，她说不能绕过学校，要我与周向学校检举。

5月8日约好我晚上向组织交代。中午我上张家去找郭。我与郭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要他回学校念书，向家里讲X的事。周也来了，约好第二天我上郭家去。我又尽力控制周，不让周去交代，说好陈老师一找他，他就向我说情况。

[64年8月另一份材料：“当时我大量利用周国平，让他把陈老师意图告诉我，用他来加强争取郭的力量，与他合力拉郭回校。我对周说：‘一切目的全在救郭。企图外逃责任全在张。’周国平是受了我的害的。”]

5月9日中午，陈老师不让我去郭家。下午郭与周来找我（张似乎也来了）。我问上哪儿？郭：上张家。我不干，回头走了。回房间，一想郭完了，大哭一场。陈老师知道了，把我叫去，要我去张家。我走到半路，周来找我，说张他们在烧东西了。我急忙赶去。我要他[指郭——04]把一切告诉我，约好12日他告诉我3月后的一切事情。

10日下午，组织第一次找我[有陈、北大党委人员、公安部人员——04]，要我谈看法。我把张说成很反动（这是事实），但为自己和郭开脱。说郭是糊涂、受张支配。组织问我：是否开始时郭对我有企图，后来我不愿参加X小组，他们失望了，离开我？我否定了，说郭起先是想与我谈美学。后来是我与他分歧大，我不与他来往的。但也有可能有张在指使。关于方小早，我的回答方不想参加X，他劝我别参加，因为我出身不好。后来，方恨我，认为我陷害了他。其实我的目的是保护他，但没有想到反而把他牵了进来。

5月17日中午，郭又来找我。张、孙也一起来。上课时，郭找我说话，我避开了。第二天上心理课，我看郭来，不睬。中午，他被带走了。

5月20日组织要我交代。交代完出来等方与周。方出来（海淀分局）向我讲了他交代的情况，其中有嘲笑[审]问他的人的事。我问他如何交代我。他说我是一心搞美学的。上面要我讲我写过的东西，他就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上面问他要政治的，他说没有。我：你与郭的关系，可以推在我身上，说只因我的关系与他玩过几次。这样，方对我的不满也就消失了。

对于周，我利用他对郭的感情，要他也包庇郭，为郭开脱，让他说，是张坏，害了郭。

[64年7月30日交代记录稿：“（63年）7月25日，郭世英来校，他已转变得很厉害。我觉得自己更孤独了，也产生过要进步的念头。”]，[64年9月交代材料：“7月25日郭来校。谈了一个多小时对错误的认识。我给他看了5月29日信，他似有泪水，但终于冷冰冰地说：‘咱们以前不一样，现在还是不一样。’这是在划界限。他走后，我又给他一信，很短。内容可能有‘自己也觉得该改造了’之类。”]

64年2月除夕他回校。谈了一个多小时。我问他怎么堕落的。他没谈几句，有人叫他走，未听下去。那天他问，听说你的“人道主义”已写完了。

我说没有。基本观点都动摇了，很难写下去。他：我认为党是最人道的。我：我并不认为党不人道。我研究的是一个玄学的问题。即什么是人道主义。（企图掩盖自己的反动本质）。此后，无来往了。他的改造情况，我从班主任那儿也听来一些。知道他已经恨我了。

[64年9月交代材料：“64年2月12日，郭世英来校。我去看他，心里很矛盾：不知他变了没有。他对我抱有敌意。心里很难受。也有些想改造。我不知道他怎么变的，以及他怎么堕落的，他对我讲了些。也讲了要进步，必须靠拢组织、彻底交代。我虽然相信他的话，却做不到，反而觉得人们全

把我抛弃了”]

在周笔下，曹怎样巴结—利用—出卖郭；又怎样充当X小组事件告密者，说得煞有介事，绘声绘色。故事倒也新奇，惜乎稍嫌离谱。